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 ——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

张武军 著



中华书局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
——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

张武军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 / 张武军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3.9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ISBN 978 - 7 - 101 - 09457 - 2

I. 从… II. 张… III. 左翼文化运动—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0770 号

书 名 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

著 者 张武军

丛 书 名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

责任编辑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¼ 插页 2 字数 251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457 - 2

定 价 39.00 元

本书受到2010年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
“多元文化与渝派文化研究”资助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编委会

主 编：刘明华

编委会：

方有国	王本朝	代 迅
刘明华	肖伟胜	余 纪
何宗美	胥洪泉	曹 建

总 序

西南大学博雅论丛在中华书局出版,对于文学院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同仁们,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丛书题名“博雅”,缘于我院前辈吴宓先生早年倡导的大学应该培育“博雅之士”的教育理念,学院的院训亦为“仁爱·博雅”。因此,博雅论丛的出版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是为纪念吴宓先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八十周年;二为整体展示学院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成果,推进学科建设更上层楼。

近年来,各大学对科研工作高度重视,一个重要动力是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在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目标。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的西南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有六十年的积累,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此传道授业解惑,学术成就斐然,为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的传统,形成了良好的风气。由于各种原因,学科平台建构曾一度滞后,自然也影响了更好更快的发展。好在根基在,风气有,大家有沉稳的心态,在守望学术的时候,也调整思路,积极争取各级各类研究项目,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确保有良好的基础和环境能安心从事科研工作。学校和学院也尽可能提供有利于科研的条件,使中青年学者能够集中精力,以便完成高水平成果。更有一批优秀的青年才俊,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理论素养良好,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拓展,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特色,向学术界交出了比较满意的成果,从而整体推进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本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申报成功,就是学术界的前辈、同行和朋友们对这个优良传统的肯定,对近年努力工作的老中青学人辛勤劳动的肯定,对这个学科群体智慧和力量的肯定。丛书的首批作者都是近年毕业的博士,其成果多是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项目及博士基金的结题成果。在专业鉴定上,已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这批成果陆续出版,必将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沟通,并促进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几年前,当中华书局出版我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论丛时,我曾在序

中表达过自己对学术工作的认识,那也是自己的信念与坚守。现在看来,还未过时,我援引这段文字作为这篇短序的结束,与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及读者共勉:

一个单位,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有一个持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既不能中断,也无法飞跃。学术不能搞大跃进,学术工作无法春耕秋收。学术活动是一代又一代有志于学的学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个人的学术生命在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延续。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学术之花才能结出富有学术含量的硕果。学术工作是艰难的,学术研究也是快乐的。——正是上面这些共识,使得这一个群体薪火传承,多年坚守在古代文学的领地,耕耘着辛勤,收获着快乐。

感谢中华书局对西南大学博雅论丛出版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回报社会和学术的一个最好形式。

刘明华

2010年12月冬至夜

于西南大学文学院

目 录

引 论	1
-----------	---

上 编

第一章 “国防文学”的提出	15
第一节 “国防文学”的首次提出	16
第二节 新政策指引下重提“国防文学”	18
第三节 政治上的“国防政府”和“国防文学”的流行	20
小 结	24
第二章 从《对马》看“国防文学”	26
第一节 作为“国防文学”范本的《对马》	27
第二节 《对马》是苏联的“国防文学”作品	30
第三节 左翼文学界对于《对马》的接受	33
第四节 苏俄意识与中国民族话语	37
小 结	40
第三章 民族话语中的“岳飞式”和“水浒式”	42
第一节 左翼文学民族话语中的“岳飞式”	42
第二节 国家主义话语中的“岳飞”宣传	51
第三节 右翼文学中的“岳飞”书写	56
第四节 左翼从“岳飞式”到“水浒式”民族话语的演变	63
小 结	70

第四章 《赛金花》与“国防文学”	72
第一节 《赛金花》:左翼“国防文学”的标本	72
第二节 《赛金花》引发左翼文学界内部的争论	75
第三节 国民党和右翼文学界眼中的“赛金花”	77
第四节 租界民族主义传统中的《赛金花》	81
小 结	93

第五章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提出和“两个口号” 论争的再解读	94
第一节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提出	94
第二节 “两个口号”论争与胡风	98
第三节 民族危机中依然很“左”的鲁迅	101
第四节 “两个口号”论争中冯雪峰和鲁迅的差异	105
小 结	114

下 编

第六章 “中国高尔基”评价中的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	119
第一节 “中国高尔基”:走向世界的诉求	123
第二节 “中国高尔基”之说探源与国共在民族话语上的争夺	126
第三节 鲁迅对于高尔基的接受	134
第四节 盖棺论定:鲁迅是“中国高尔基”	140
第五节 从“中国高尔基”到中国现代的“孔子”	150
小 结	156

第七章 民族的旗帜和左翼的旗帜	157
第一节 郭沫若的民族精神家园构建	157
第二节 从民族的旗帜再到左翼的旗帜	170
小 结	175

第八章 从新启蒙到民族形式 ——左翼文学民族话语走向探微	176
第一节 “国防文学”中的“新启蒙”	176
第二节 文艺界“民族形式”运动探微	181

小 结	186
余论:含混的组织表态和“两个口号”的历史纠缠	187
第一节 旅苏领导人倾向“国防文学”	187
第二节 陕北的含混表态	192
结 语	206
附表:左翼文人心目中的“国防文学”作品和题材	216
参考文献	222
后 记	233

引 论

一、缘 起

左翼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传统富矿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一度遭受冷落,进入新世纪后,左翼文学又重新被视为“一个学术的生长点”^①。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史料搜集和整理基础上^②,学界有不少对于左翼文学通史式的论述,如张大明的《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刘海波的《20世纪中国左翼文论研究》、曹清华的《中国左翼文学史稿》等^③。这几部左翼文学著作尽管是通史式阐述,不过基本上对于左翼文学的发生着墨很多,而对走向关注却很不够。另外,在左翼文学的发生学研究上,也还有一些专门的论著,较有影响的有程凯的论文《“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陈红旗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艾

① 王富仁:《有关左翼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第101—103页。

② 有关左翼文学的史料整理汇编情况可参阅:陈瘦竹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姚辛编撰:《左联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左联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

③ 张大明:《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曹清华:《中国左翼文学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刘海波:《20世纪中国左翼文论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

晓明的专著《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等^①；在汕头大学召开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少人也都着重谈及左翼文学的发生^②。总体而言，关于左翼文学如何发生，它是如何承接20年代文学革命，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关于它的走向是如何转向40年代抗战文学，即如何强化“中国”，左翼如何倡导民族话语，学界并无多少关注。

左翼文学界强调民族主义书写和国家认同是左翼文学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话语转型。要考察左翼文学界从阶级话语向民族话语的转向，有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值得我们重视，即民国语境。在左翼文学转向民族话语的提倡过程中，作为曾和国民党对抗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作家，他们也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意义和价值。“辛亥”和“中华民国”及其“三民主义”为共产党人和左翼作家提供了极富弹性的言说空间。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莫过于中华民国的建立，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中国”这一名称更多指涉文化层面，如同过去的“天下”一样，笼统而又宽泛。确切地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才使得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得以生成。中华民国不再是一个宽泛的“中央之地”，不再是仅仅笼统指涉文化层面，而是具有明确的政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尽管中华民国成立后内部各派军阀混战不止，但毕竟“民国”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有关中国形象的书写也开始频繁出现在作家笔下。当然，五四时期，作家更多强调个性主义的表达，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强调阶级的诉求，而国民党右翼文学虽强调国家书写和国家认同，但更主要的目的是对抗或消解左翼文学。只有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在与入侵的异族他者的对抗中，左翼文学界才调整了自己的姿态，转向民族话语的诉求，“中国”形象才被完整而又充分地呈现出来。

左翼文学开始从过去的阶级话语向民族话语转型，其标志就是国防文学概念的提出。“国防文学”的“国”表明左翼文学界开始注重对“中国”形象的书写。左翼所提倡的国防文学这一口号背后也有一个中

① 程凯：《“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第46—62页；陈红旗：《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吉林大学博士论文，导师为陈方竞，cnki编号为2005.109222；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

② 易崇辉：《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第205—207页。

华民国的政治实体作为支撑。而这个国家在当时只能是由中华民国来担当,左翼人也意识到并认可了这一点,国防文学背后的“国”就是中华民国。左翼作家提出的国防文学概念源自共产党人提出的国防政府主张,也就是今天的很多研究文章都指出的,国防文学产生的政治背景来自于王明所提出的《八一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尽管后来有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清算,但是《八一宣言》所代表的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也成为以后“国防文学”提倡者坚信自己口号正确的政策依据。

1934年起,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策随着欧洲的形势而有所变化。苏联为了拖延大战爆发的时间,以便本国经济和国防建设不受干扰,开始强调世界范围内的反战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苏联人相信只有国民党政府才可以抵抗日本,于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全力与国民党合作。作为共产国际政策的坚决拥护者,王明也跟着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在著名的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结合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提出了“反帝人民统一战线”和“人民国防政府”。后来根据大会发言整理的正式修改稿刊登在同年10月1日的《救国报》上,题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组建“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①。后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传达到陕北,中共中央在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建立以“国防政府”形式为主的统一战线。

但是左翼文学界提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后,其内部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对后来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左翼文学从阶级话语向民族话语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是现对于从30年代革命文学到40年代抗战文学的转变,各种文学史教材表述极为笼统含混,或根本就不涉及。在现行的教材中,一到抗战文学部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从七七事变的爆发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讲起。从革命文学到抗战文学,大家似乎都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不就是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抗日战争的爆发自然而然地引发了文学上的变化吗?

可是,从左翼文学到抗战文学的转变真的如此自然而然么?如果说民族危机的加剧促使了中国抗战文学的产生,那么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文人就在文学上抛出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但是它为什么会遭到左

^① 有关王明的“国防政府”主张提出的相关情形见杨奎松《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

翼文学界的一致反对呢？难道仅仅因为九一八之后的民族危机没有全面抗战时更严峻么？再比如，如果说向民族话语的转变是中国作家包括左翼文艺界在内的共同选择，那么如何解释抗战期间国共民族话语上的交锋？又当如何解释左翼内部“两个口号”的论争呢？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自己人”的误会和“宗派因子”作祟么？过去，我们常常描述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要么为敌我矛盾，要么为自己人因为宗派而产生的“误会”。但是，这样笼统的表述将遮蔽诸多丰富的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更影响到我们对后来的抗战文学的理解和把握。

即便我们继续沿用通行的文学史叙述框架，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向40年代抗战文学的转换是必然的、合理的，也不能漠视这一转变过程的复杂与充满争议。抗战文学的产生绝非水到渠成，它也并非全面抗战一爆发就自然形成。然而，不仅现行的文学史对于这一转变缺乏应有的注意，一些亲历者也同样有意忽略“抗战文学”的形成过程。如老舍当时所说的“极自然的、合理的发展为抗战文艺”^①；又如楼适夷后来总结的，全面抗战的爆发“使一时展开的所谓两个口号的内部论争，自然归结为一个口号：‘抗战文艺’，使所有文艺工作者，都站在这面共同的大旗之下了”^②。也有台湾学者除了描述语气和态度上与大陆学界有差别外，对于现代文学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转换也视为理所当然，例如李牧在他的《三十年代文艺论》中谈到：“其实，这两个口号都是笨拙的，抗战而后，自然而然的都被淘汰而称为‘抗战文艺’了。”^③

不论是老舍当时的表白还是楼适夷后来的概括，他们都有珍惜文艺界统一战线成果不愿多谈分歧的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歧就不存在，更不能成为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忽略三四十年代文学转变的理由。事实上，众多视抗战文学为“自然”产生的总结经受不住细致的推敲，抗战文艺产生之前，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学口号：国防文学和救亡文学。

自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后，尽管争议很大，但就当时的实际而言，左翼内外都是“国防”口号和理念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自然在文学上也是“国防文学”的时期。随着日本的进一步入侵华北，“国防”的提法也渐渐被“救亡”的口号所替代，在文学上“救亡文学”也逐渐取代“国

① 老舍：《哀莫大于心死》，《文风》1942年6月。

② 楼适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1），重庆出版社，1989年，序第2页。

③ 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第101页。

防文学”的称谓。标志事件是1936年5月6日在上海创刊的《救亡情报》和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的《救亡日报》，前者是1935年来成立的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为首的上海各界联合救国会会刊，后者是1937年7月28日成立的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刊物。这也表明，上海文化界团结的局面在救亡旗帜下逐步形成，尤其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成立后迅速展开了一系列的实际工作，成立了十多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宣传演出，在《救亡日报》上开辟文艺副刊，刊登有关救亡题材的作品。虽然《救亡日报》创刊时，已过了被我们后来称之为全面抗战爆发标志的1937年7月7日，但“抗战文艺”这一口号却并没有产生和流行。1937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周年祭，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上海战时文艺协会联合发起召开纪念大会，会议决定组织全国性的文艺界救亡协会，并选出了郭沫若、郑振铎、巴金等为临时执委。大会除了有一条关于纪念鲁迅的临时决议外，还有针对当时现状的两点动议，“邀请现有一切文艺作家及团体为文艺界救亡协会会员”，“请政府即日宣布对日绝交”^①。这些都表明当时的文学仍然属于“救亡文学”口号统领着的时期，还远远没有进入抗战文艺的阶段。

上海战事失利，南京随即失守，国民党政府明白除了对日作战，别无他途。蒋介石相继发表了庐山讲话和“迁都宣言”，表示出积极主动抗日的姿态。国民政府虽然没有公开对日宣战，但已经不再排斥和禁止“抗战”的说法，抗日和抗战的字样再也不用“抗×”来替代了。在这种情形下，一些抗战团体相继用新称谓取代了原来的救亡的称谓。仅就文艺界而言，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5月4日其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创刊，这才宣告了中国抗战文艺“名副其实”的开始。而在此之前的“国防文学”和“救亡文学”时期，即便有人提出抗战文艺的口号，也不会得到认可。例如，杨晋豪很早就提出“抗战文艺”这一概念，“一·二八事件”之后，他就写了名为《中国文艺界往那儿走》一篇短文，提出“全民族一致的抗战文艺运动”。“两个口号”论争时期，他又写了《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小册子和《〈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后记》一文，反复强调：“为了使现阶段的中国文艺运动，能有一个更自然、更正确而且更通俗的文艺口号起见，所以我特在已存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外，另又提出了‘抗战文

① 文天行编：《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1页。

艺’这一口号。但是有人说,‘国防文学’和‘抗战文艺’在英文中都是 Defence Literature,意义相同,所以是用不着另提新口号的。”杨晋豪解释说,“国防文学”重在防御,而“抗战文艺”是“对于正在入侵进来的敌人立即作反抗的战争”,而且他分析了中国的现状,指出防御已经是过去的状态,而现在“早已需要全民族一致的抗战运动了”^①。不过,他这一更为合理的口号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被采用。

综上所述,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民族话语呈现出的是非常复杂的形态,而左翼文学的民族话语形成和发展就更加复杂。当然,后来我们对左翼文学民族话语的评判总是站在后来者的立场,尤其是 1949 年后,忽而说这个左了,忽而又说那个犯了投降主义的右倾错误等等,事实上这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即民国语境。本书就是要重返民国语境,在民国的背景下来探讨和梳理左翼文学由阶级话语转向民族话语的复杂过程,探讨和分析这一过程中的分歧与争议。一方面是左翼文学界内部在从阶级话语转向民族话语时产生的分歧,另一方面是左翼文学界和右翼文人在民族话语上的差异乃至最后的对立。事实上,左翼文人所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国”显然是以中华民国作为具体依托,左翼文人中有关民族主义理论的阐述显然和孙中山三民主义密不可分,这自然又牵扯到民国背景和民国语境问题。因此,要完整和全面地探析左翼文学的民族话语,我们就不能不重返民国语境中去。

与此同时,本书之所以以分析左翼文学的阶级话语向民族话语转向为主,是基于以下的考量:

第一,左翼文学原本和民族主义在理念上有不小的差距。左翼文学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同样秉承“工人无祖国”的理念,为被压迫的阶级进行文学书写。因而,它比原先就提倡民族主义理念的右翼文学更复杂,更具有文学史转折的意义。

第二,不管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文学成就如何,它毕竟为现行的大多数文学史教材所着重书写,并把它作为 30 年代文学的主导,而 40 年代文学则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民族话语表现最强盛的时候。如何阐述左翼文学从 30 年代的阶级话语到 40 年代民族话语的转变,本应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命题,但奇怪的是,目前学界似乎把左翼文学的民族话语视为

① 杨晋豪:《〈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后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045—1047 页。

理所当然,却尽力挖掘本就标举“民族主义”的和国民党右翼文学的民族话语意义。这就使得有关国民党右翼文学的民族话语研究成为当下热点,有关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反而成为薄弱点和盲点。因此,分析左翼文学在30年代后期的民族话语转向具有填补文学史叙述空隙的价值。

第三,在向民族话语的转向过程中,左翼文学内部的确充满了分歧,出现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并引发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因此,关注和分析左翼文学中的民族话语转向也是现代文学发展历史的自身呈现,而非后来者的牵强附加。

二、研究思路之梳理

在探讨左翼文学的阶级话语向民族话语转变之前,我想首先对于整个现代文学中的民族话语研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之所以引入民族概念,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起就和民族国家问题纠缠在一起。晚清以降,不论是中国的社会思潮还是中国的文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最主要原因莫过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被引入。有学者言:“其实,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①尽管“民族”这个语词是如此重要,但要给它一个准确的界定却并不容易。正如很多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著作所引用的白芝皓(Walter Bagehot)的说法,“若你不曾问起民族的意义为何,我们会以为我们早已知道答案,但是,实际上我们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民族是什么,也很难给它一个简单定义”^②。尽管有关“民族”概念的界定到目前仍然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各种界定中仍有一些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民族”所包含的现代性意义,“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动力”^③。

①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

②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导论”第1页。另外,在韩红翻译的英国人厄内斯特·盖尔纳所著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徐波和陈林为此书写了题为《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的代序言,其中也引用了Walter Bagehot关于“民族”概念的说法,不过翻译有所不同(见“代序言”第2页)。

③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